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施米特思想的隱秘詩學源頭——施米特與多伯勒：思想家與詩人的精神對話 [The Hidden Poetic Source of Carl Schmitt's Thought: Carl Schmitt and Theodor Däubler, A Spiritual Dialogue between Philosopher and Poet]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JIANG, Linjing
Publisher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15 23:32:56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4802

施米特思想的隱秘詩學源頭

——施米特與多伯勒：思想家與詩人的精神對話

The Hidden Poetic Source of Carl Schmitt's Thought:

Carl Schmitt and Theodor Däubler,

A Spiritual Dialogue between Philosopher and Poet

姜林靜

JIANG Linjing

作者簡介

姜林靜，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講師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JIANG Linjing, Lecture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Fudan University

Email: janetamen@gmail.com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constant influence of Theodor Däubler's poetry on the thinking of the famous German philosopher and jurist Carl Schmitt.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Schmitt's two interpretations of Däubler's major work *The Northern Lights* in 1916 and 1946, the influence is analyzed from a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al perspective. In his first interpretation, Schmitt carries out 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 language and finds a critique of modernity as a whole. In the second commentary, he admits that he had misinterpreted the poet's spiritual origins in his earlier monograph. Through Schmitt's understanding of Däubler's poetry, the Christian origins of Schmitt's own thinking are evident, the basis for his self-interpretation and self-justification during and after World War II. Inspired by Däubler's poetry, Schmitt confirms the absolute enemy - the modern antichrist, who simulates the figure of Christ, and stresses that one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political friends and enemie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hidden poetic origins and dangers of Schmitt's political and legal thought, which has been both deeply influential and highly controversial in the academic world.

Keywords: Carl Schmitt, Theodor Däubler, political theology, modern poetry, modernity

一、引言

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無疑是二十世紀最具爭議的法學家，同時也是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最具魅力的人物之一。他年輕時代便參與起草著名的魏瑪憲法，後卻因參與納粹政權而被控為“第三帝國桂冠法學家”，在戰後被送交紐倫堡審判，但最終未被起訴。隨後他隱居故鄉普萊騰堡，在那裡寫作直到1985年以95歲高齡去世。施米特雖然經歷人生的跌宕起伏，但因與納粹政權的關係而備受非議，學術界至今對他仍有頗多紛爭，但其思想卻具有持續影響力，近十幾年來，施米特思想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廣泛關注，幾成熱學。對施米特的討論也逐漸從政治學、法學拓展到了更為廣闊的思想領域，如現代性研究和文化批判。

儘管作為法學家、哲學家和政治學家的施米特已得到了詳盡討論，但除此之外，施米特還有一條至今仍未被專門研究的隱秘思想脈絡：他一生研讀文學作品，通過與詩人作家的對話汲取精神養料，表達闡述其思想，甚至影射不使用學術話語言說的一些重要思考。他的這種文學評論對象並不只局限於著名德文作家如歌德、席勒、荷爾德林、里爾克，還包括至今幾乎被遺忘、卻極受施米特重視和欣賞的詩人泰奧多·多伯勒（Theodor Däubler）和康拉德·魏斯（Konrad Weiß）等人。他還深入探討過莎士比亞、維吉爾、梅爾維爾等世界文學家的作品，甚至也涉獵到作為詩人的毛澤東。

隨著施米特書信日記的逐一出版，他的文學批評思想在西方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本文將研究施米特與詩人多伯勒之間的個人關係與精神關聯，從施米特對多伯勒極富深義的兩次闡釋的同異中窺探施米特思想的隱秘詩學源頭。開拓這一從詩學角度進行的施米特研究，不僅會為詩學本身，也會為政治學、法學領域的施米特研

究開啟一個有意義的新視野，因為他的文學批判不僅呈現了其思想與詩之間的關係，還更進一步展示了其思想與基督教神學之間的關聯。

二、多伯勒生平

“在法國，當紀德被問至誰是最偉大的詩人時，他給出的著名回答是：‘維克多·雨果，烏拉！’在德國，沒有人會理解我如此回答：‘最偉大的現代詩人是泰奧多·多伯勒，烏拉！’。”^①這是施米特 1949 年的隨筆中對多伯勒的一段極度讚美。但是，即使是《德國古今作家詞典》^②中也沒有提及這個詩人的名字。我們不僅要問：這個多伯勒是誰？

泰奧多·多伯勒 1876 年出生於亞德里亞海邊的港口城市的里亞斯特，此地當時隸屬奧匈帝國，雖然地理上屬於南歐，語言和文化上卻明顯具有中歐特色。多伯勒的父母都是德國人，父親是個大商人。雖出生富裕家庭，多伯勒卻從青年時代就開始了漂泊不定的生活，如同一個流浪的波西米亞人一般到處停留，他遊歷德國、法國、義大利、希臘、埃及，卻無處為家。22 歲的他沒有任何前奏性作品就開始創作其代表作《北極光》，整整寫了 12 年。1910 年，這部由超過三萬句詩行組成的龐大史詩以三卷本形式出版。^③

無論身在何處，多伯勒都生活在藝術家圈子裡。作為詩人的他對現代藝術也極富鑑賞力，在未來派、表現主義和達達主義藝術家中都很受歡迎。但是，大家關注的似乎更多是他獨特的人格魅力與個人生活，而非他的作品。《北極光》從未被當時的讀者認真嚴肅

^① Carl Schmitt, *Glossarium. Aufzeichnungen der Jahre 1947- 1951*, ed. Eberhard Freiherr von Medem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1), 257. Here on 15th July 1949.

^② Here refers to *Deutsches Schriftstellerlexikon,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ed. Günter Albrecht (Weimar: Volksverlag, 1961).

^③ 1910 年出版的《北極光》即佛羅倫斯版，多伯勒終生都在不斷對這一版本進行加工修改。這一版本 1910 年由 Georg-Müller 出版社在慕尼黑出版。

地對待過，甚至至今仍鮮為人知。大部分人只想滿足對這個怪人的好奇心，卻不知他這部幾乎沒有情節的冗長作品到底表達了什麼。多伯勒如此描述自己作為詩人在德國的處境：“我多多少少或許被當作一個有趣的現代詩人，但人們卻不關心《北極光》。他們不想知道，真正的我是怎樣一個人。”^①

1934年，57歲的多伯勒死於肺結核。不幸的是，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德國表現主義的重新發現，也並未替他贏來身後之名，雖然他生前是該流派最具影響力的開拓者與代表之一。而今天德文文學思想界對多伯勒德的關注，則要歸功於施米特的長期推崇和介紹。

三、施米特與多伯勒的交往

事實上，如果想深入研究施米特的生平與作品，就不能迴避多伯勒對施米特產生的巨大影響。兩人之間二十多年的交往對施米特的世界觀有著決定性影響。施米特甚至認為，如果海德格爾與多伯勒而不是與荷爾德林的精神相遇，那麼，多伯勒就會成為德國最偉大的語言哲學家^②，因為多伯勒是少數“真正的”詩人之一，他用詩啟示了西方的命運。尤其是《北極光》，對施米特來說是“取之不竭”、“可以陪伴終身的”^③作品。的確，多伯勒的詩歌陪伴了施米特近一個世紀的漫長生命，並且在施米特最黑暗的歲月給他帶來安慰。遺憾的是，這段關係在此前的施米特研究中還未被詳細探討過。

^① 參見多伯勒於1922年3月9日寫給Toni Sussmann的信，現藏於柏林Akademie der Künste 泰奧多·多伯勒檔案室內。

^② Ernst Hüsmert, “Die letzten Jahre von Carl Schmitt,” in *Schmittiana I*, ed. Piet Tommissen (Brüssel: Eclectica, Jg. 17, No. 71-72, 1988), 46.

^③ Carl Schmitt & Armin Mohler, *Carl Schmitt- Briefwechsel Mit Einem Seiner SchÜler*, ed. Armin Mohler, Irmgard Huhn and Piet Tommissen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5), 231. Here Schmitt to Mohler on Jan. 5th 1957.

從施米特早年的書信和日記中可以發現，青年時代的他是個充滿激情的讀者，而且很早就表現出作為一名優秀文學評論家所應具備的深入獨特的審美素養，尤其是對現代藝術的敏銳感受力。1912年，施米特與猶太朋友弗里茨·艾斯勒（Franz Eisler）一同出版了以《影子的裂縫》為題的諷刺文集，對當時的娛樂文學冷嘲熱諷之餘，嚴厲批判了1900年間自然主義文學及其代表人物。^①正是此時，兩人熱切關注起多伯勒的作品。施米特於1912年初在杜塞爾多夫結識多伯勒，並於同年夏天，與多伯勒、艾斯勒和阿爾伯特·寇曼（Albert Kollmann）一同徒步穿越萊茵州漫遊至阿爾薩斯^②，這使施米特對多伯勒其人其思有了更深入的瞭解。於是到1916年，28歲的施米特發表了藝術評論專著《多伯勒的〈北極光〉——三論作品的基礎、精神與現實性》。這本專著與此前充滿諷刺意味的《影子的裂縫》形成強烈對比，嚴厲的論戰家施米特在此成了激情四溢的衛士，為這位在他看來被不公正地忽視了的偉大詩人朋友極力辯護。

1920至1926年間，施米特與多伯勒頻繁通信^③，在流浪多年的多伯勒於1926年病重回到柏林後，兩人更是經常互訪。同年年底，施米特還在呼籲建立“多伯勒社團”的申請書上簽字。多伯勒在寫給施米特的書信中則多次表達了對這種認可的感謝。“您是《北極光》為數極少的朋友之一，您給了我力量。”^④“知道您曾經開啟

^① 施米特與艾斯勒一同以 Johannes Negelinusmox Doctor 為筆名出版了這部早期作品，*Leipzig, Skiamacheten-Verlag* (1913)。1995年，Ingeborg Villinger 又再版該書，並對其做了極出色的評註。參見 Ingeborg Villinger, *Carl Schmitts Kulturkritik der Modern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5)。

^② 參見 Thomas Rietzschel, *Theodor Däubler. Eine Collage seiner Biographie* (Leipzig: Reclam Verlag, 1988), 385。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多伯勒與施米特交往甚密，但這卻是這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時期出版的多伯勒傳記中唯一一處提到施米特名字的地方。

^③ 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州立檔案館（Nordrhein-Westfälischen Hauptstaatsarchiv）的卡爾·施米特檔案室裡，保存著多伯勒寫給施米特的17封信和明信片。

^④ 參見1925年7月3日多伯勒給施米特的信，存於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州立檔案館卡爾·施米特檔案室，RW 265-431, Nr. 14。

並閱讀我寫的書，對於我是極大的安慰。”^①的確，施米特不僅是為數不多真正熟悉並崇敬多伯勒的人之一，而且也主動承擔起為詩人贏得聲譽的任務。自 1910 年起，他就異常努力地推介多伯勒的作品，此後畢生都在極力讓社會認識到這位詩人的重要性，並為世人對《北極光》所表現出的“愚蠢的無所謂”^②倍感沮喪。

然而到了 1946 年，情況出現了變化：施米特發表名為《兩座墳塋》的文章，對年輕時寫的闡釋多伯勒的文章進行了修改與補充，甚至承認，他早年幾乎誤解了《北極光》。這篇轉折性文章後來被收進 1950 年以《在被擄中獲救》為標題出版的戰後作品集中。^③其實，施米特的這種態度轉變從他早年書信和日記中對多伯勒好惡交替的矛盾評述中就有所體現。1912 年兩人初識時可以說是彼此欣賞，施米特甚至稱多伯勒是“當代最偉大的詩人”^④，“一個不受束縛的天才”^⑤，“世界上最友好和真誠的人”^⑥。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施米特逐漸對多伯勒產生了一種恐懼，特別是在 1915 年 10 月到 12 月期間，兩人在慕尼黑一同修改施米特《三論〈北極光〉》的手稿，施米特在那段時期的日記中不時道出他對多伯勒——這個在他看來自私、傲慢、虛榮的詩人的憤怒和反感，甚至稱其為“豬”和“大寄生蟲”^⑦。

^① 參見 1923 年 7 月 16 日多伯勒給施米特的信，存於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州立檔案館卡爾·施米特檔案室，RW 265-431，Nr. 10。

^② Schmitt & Mohler, *Carl Schmitt—Briefwechsel Mit Einem Seiner SchÜler*, here Schmitt to Mohler on Dec. 22nd 1948, 42.

^③ Carl Schmitt, *Ex Captivitate Salus, Erfahrungender Zeit 1945/47*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2010), 51.

^④ Carl Schmitt, *Jugendbriefe. Briefschaften an seine Schwester Auguste 1905-1913*, ed. Ernst Hüsmert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0), 157. Here Schmitt to Auguste on Aug. 19th 1912.

^⑤ Carl Schmitt, *Tagebücher Oktober 1912 bis Februar 1915*, ed. Ernst Hüsmert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3), 62. Here on Dec. 25th 1912.

^⑥ Schmitt, *Jugendbriefe*, 159. Here Schmitt to Auguste on Aug. 26th 1912.

^⑦ Carl Schmitt, *Die Militärzeit 1915 bis 1919, Tagebuch Februar bis Dezember 1915, Aufsätze und Materialien*, ed. Ernst Hüsmert and Gerd Giesler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5), 155. Here on Nov. 10th 1915.

儘管如此，施米特對多伯勒詩歌的癡迷與高度評價卻幾乎沒有改變過，可以說，由此開始施米特日後舉世矚目的思想增加了一脈詩學源流，1916年的《三論〈北極光〉》正是這種思想的一個引子。所以，研究施米特的多伯勒闡釋對於瞭解施米特的思想背景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四、“本原-超驗”的語言藝術——施米特對《北極光》的研究（一）

施米特在1916年的《三論〈北極光〉》一書中首先評價了《北極光》的詩性語言，他認為多伯勒的語言特徵表現在其“奇特的反傳統性與原創性”^①。首先，他將多伯勒詩性語言的本質描述為“精神與話語”的奇異交織——語言的意義質地與其特有的影像性、音調性與色彩性融合，共同構成一個話語、夢境與神話的生動統一體，從而彰顯出“語言內在固有的豐富性”^②。接著，施米特又強調，多伯勒是個完完全全的抒情詩人，而非學者式詩人，對多伯勒而言，語言絕非承載詩人主觀思想與個人哲學的工具，而是讓位於事物原本的價值，詩人從而讓事物本身說話。

初讀《北極光》的一般讀者都會發現，多伯勒的詩歌中充斥著無數華麗而奇怪的自造詞，其語言顯得艱深而缺乏可讀性。雖然施米特也承認《北極光》的語言有些生硬，但同時，他更看重表面的粗重與瘋狂之下隱藏著的傑出詩性藝術。他指責那些已經習慣了娛樂文學而無法理解多伯勒的讀者，認為多伯勒的特殊語言正是“其作品的過人之處”，同樣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人們還遠離多伯勒的原因”^③。

^① Carl Schmitt, *Theodor Däublers "Nordlicht": drei Studien über die Elemente, den Geist und die Aktualität des Werkes*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1), 17.

^② Ibid., 45.

^③ Ibid., 40.

為了證明多伯勒詩性語言的獨一無二性，施米特還將瓦格納和多伯勒進行了對比。他認為，兩者都是“暴力式地”對待語言的。多伯勒的暴力針對的是語言本身，他從“語言內在固有的豐富性”中發掘語言自身的美；相反，瓦格納卻霸佔了音樂，從音樂中吸取骨髓注入語言。他指出，兩人都憑藝術直覺認識到有必要將語言轉化成另外一種形式。瓦格納以音樂為工具賦予詩歌額外的表現力。根據他的音樂理論，歌詞和聲音應共同發揮作用以達到盡可能完美的戲劇表現力。然而，施米特認為瓦格納的方式是“外在的、機械的”，^①因為瓦格納必須通過給語言強加上音樂的外衣，才能使本來通俗的語言發出新奇的音響。施米特指出，天才藝術家瓦格納證明了自己也同時是天才導演，與多伯勒孩子式的原始直覺相比，瓦格納對於觀眾偏好的細膩把握似乎與“大企業家”如出一轍。通過詩歌與音樂的結合，他讓他的觀眾得到了至高的享受。可是這樣的藝術最終只能算是娛樂。

施米特認為，多伯勒與瓦格納不同，他忠於語言的本質，語言本身就是詩人最有力的工具，也是他唯一的手段。除了語言，他不需要任何其他手段，因為語言本身已經包含了所有藝術效果巨大豐盛的可能性。以這種方式，詩人成功地讓語言自己歌唱、繪畫，甚至思考。這是詩人對語言完完全全的奉獻，也正是多伯勒之所以偉大的本源——在語言超驗本質面前的敬畏與謙卑。

施米特還特別強調，多伯勒的這種謙卑是不自知的，與“自認為被某種更高的力量選為工具，變成了藝術天才”^②的那種浪漫派不同。後者其實只由自己制定藝術標準，而後宣告這種標準即是神的聲音。與此相反，多伯勒則在信仰中找到了自己作為上帝“高貴

^① Carl Schmitt, *Theodor Däublers "Nordlicht"*, 41.

^② Carl Schmitt, *Politische Romantik*, 6th edition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8), 30.

的筆”這一使命，並且自覺地去履行這一使命。^①多伯勒如敏感的孩子般經歷、感受、洞察著這個世界，然後把它轉化為思想的影像，並用詩歌語言來描述，這一過程被施米特稱為“影像化詩歌”（*pictura poesis*）^②。通過這種雙重轉化過程——從洞察到影像，再從影像到詩歌，物體的顏色、線條、形狀、聲音、性情全都融合為和諧的整體，生成一個影像與象徵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所有事物都擁有超驗的精神意義。詩人的角色就是如此，將透過個人感受產生的影像以語言的形式進行重塑，使事物的精神意義變得清晰可見。換言之，多伯勒沒有簡單地直接再現現實世界，而是將詩人被現實世界喚起的詩性領受、情感、渴望和希求轉化為詩性影像。當整個世界被轉化為影像與象徵時，現實世界的事物也就擺脫了它們日常的具體性質，成為具有精神意義的另一個世界中的神秘影像。施米特稱多伯勒的創作過程——體驗—影像—詩歌，是一次“對自然主義將語言作為日常理解工具的偉大拒絕”^③。

對此，施米特對多伯勒和里爾克進行的比較也能給我們一些啟發。施米特在他 1916 年的多伯勒專著中雖然沒有提到里爾克，但在其他作品和書信中，卻多次探討了里爾克的詩歌。兩位詩人之間有很多重要的相似處，然而，與對待多伯勒的態度截然不同，施米特卻對在當時變得越來越受歡迎的里爾克進行了批判。施米特經常諷刺這位在歐洲被廣泛閱讀的作家，認為里爾克只能寫“別緻的韻

^① Schmitt, *Theodor Däublers "Nordlicht"*, 55. “在帶著信仰的注視中，世界被認識。對於一個其本質只是直覺而非其他的藝術家來說，僅此別無。無論優美的形式意味著什麼，即使詩人可以有意識地對作品進行加工，其根本卻仍只是啟示，是恩典，是慈悲。真正在寫的是祂，詩人是祂的一支筆，一支高貴的筆，是工具。詩人完成被賦予的使命。”

^② Ibid., 36.

^③ Ibid., 47.

腳”^①：多伯勒的詩歌“像海”，而裡克爾的詩歌“頂多不過是平淡的小溪”^②。

為什麼施米特會對兩位詩人的看法與眾不同、截然相反？

對於施米特來說，關鍵是兩者對待語言的方式上有很大的區別。里爾克認為，詩歌不要表達感情，而是要表現經歷，讓事物本身清晰透徹地論述自己。其實，里爾克的詩歌創作是有目的性的，是帶著觀念設計詩歌，他相信詩人能深切洞察這個世界，可以準確地描繪這個世界，可以釋放出事物的意義和真實存在。詩人的角色是一個聰慧的觀察者，是物性世界與物性詩歌之間那個巧妙的中介人。正是由於這個理由，里爾克的詩歌在施米特看來，雖然不平庸，卻也不如多伯勒的那麼偉大。里爾克的“打掃乾淨的”美麗詩句滿足了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精緻的文學品味，也就是說，他的詩歌語言的可消費性佔據了主導，而語言本身的深刻意義反而被隱藏。

施米特認為，多伯勒與之相反，他是以原始的本能來創作。多伯勒稱為“個人的宇宙觀”的世界全貌其實並非由多伯勒自己設計並構思出來的，而是來自於他神秘的詩性潛意識或無意識。他的詩歌天性、他極具創造力的造詞能力、豐富的詩性影像以及充滿想象力的修飾構成了一種毫不做作的天然美。在《筆記》中，施米特這樣記錄道：“多伯勒：物性死亡，詞語充滿了空間！不，是音調充滿了空間，甚至將它高舉。多伯勒的《北極光》不是詞語，而是音調。它是音調性。”^③

施米特確信，用帶有目的性的日常生活語言不可能創作出偉大的詩歌，這樣的語言首先注重交際功能，因此早已遠離了詩歌。施米特批判道：“語言的社會性，與他者的關係，實用的目的性使語

^① Schmitt & Mohler, *Carl Schmitt- Briefwechsel Mit Einem Seiner SchÜler*, 115. Here Schmitt to Mohler on Feb. 2nd 1952.

^② Ernst Hüsmert, “Die letzten Jahre von Carl Schmitt,” in *Schmittiana I*, ed. Piet Tommissen (Brüssel: Eclectica, Jg. 17, No. 71-72, 1988), 40-41.

^③ Schmitt, *Glossarium*, 89.

言變得醜陋。用日常生活語言創作不出神話，甚至連一首美好的詩歌都不行，其產物不是平庸就是人工編造。”^①

相反，多伯勒卻拒絕討好讀者的口味，堅持以他獨有的詩歌創作方法清除了日常生活語言醜陋的功利性，將語言還原為純粹的審美介體。最終借助影像的力量找回了語言崇高、美麗、超驗的本質。通過對多伯勒詩歌語言的研究，施米特實際上提出了一種重要的現代批判語言觀。

五、超越現代性的努力——施米特對 《北極光》的研究（二）

通過對多伯勒詩歌的研究，施米特不僅對現代語言進行了批判，更對現代性整體現實進行了一次深刻反省。多伯勒在《北極光》中描述了人類由南向北的一次艱辛旅程，這一長途跋涉穿越了埃及、希臘、義大利和德國，直到斯堪的納維亞，終於在最北方迎來了北極光，然後又經歷了恐怖的“鐵夜”，人類最終獲取了北極光，並藉此與世界和解，得到了拯救。這一尋求北極光的曲折旅程影射著人類“步向精神，並將精神作為最終目的的另一種可能”^②：人類精神得救的啟示。施米特強調，多伯勒這種“個人宇宙觀”背後並未隱藏任何社會訴求：詩人沒有試圖對這個世界進行時論式的批判或改良策劃，他對世界的關注既不是分析式的，也不是心理學式的，更不是論戰式的。多伯勒雖然沒有明確拒絕工業社會及其意識形態，但他通過《北極光》展開了一副與現代工業社會截然不同的恢宏精神畫卷，《北極光》本身就作為機械時代的對立面而完完全全地否

^① Schmitt, *Theodor Däublers "Nordlicht"*, 43.

^② Stefan Nienhaus, "Denker und Sprecher und kosmische Strahlung: Theodor Däubler in der Interpretation Carl Schmitts," in *Theodor Däubler- Biographie und Werk, Die Vorträge des Dresdener Däubler-Symposiums 1992*, ed. Dieter Werner (Mainz: Gardez Verlag, 1996), 90.

定了這一時代。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否定沒有任何政治論戰意圖，只是“另起爐灶”地構建了現代文明純粹物質主義的反極。^①《北極光》為讀者提供了一處精神避難所，可以遠離充斥於這一喪失精神的世界中的種種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施米特認為，正是因為《北極光》單純地展示了人類發展前景的另一種可能性，所以它才超越了這個世界：“《北極光》是如此深邃，正如這個世代是如此淺薄；它是如此偉大，正如這個世代是如此渺小；它是如此充溢著上帝的靈，正如這個世代是如此缺乏靈性。”^②據此，施米特斷定，《北極光》偉大的現實意義正在於它與這個愈來愈世俗化的世界之間的關係：它填補了這個業已喪失精神的時代，詩意地保護了世界歷史的神性意義，是對否定超驗的否定。

施米特還指出，多伯勒的《北極光》與流行的時代批判形成了鮮明對比。那些憤世嫉俗的現代化批判雖然也意識到，我們這個時代缺少甚至完全喪失了精神，卻不願承認一個事實：還存在著這一狀態的完全對立面。時代批判不過徒增了對這個世界的仇恨、恐懼與絕望，卻根本無法戰勝這一無神的世代。施米特認為，大多數時代批判者只不過滿足於無力地嘆息、愁苦地抱怨上帝的無能，“他們希望看到自己被描述，希望聽到人們談論他們的絕望，並繼續保持絕望；因為從根本上來說，他們喜歡自己的狀態，他們垂頭喪氣地表示認輸，為的是可以免去行動的責任。他們不想動用爭取天國所需要動用的強力。”^③

施米特在此針對的是現代懷疑主義者的現代批判性，這與他在《政治的浪漫派》中對“浪漫的反諷”（*romantische Ironie*）的否定是一脈相承的。他認為，這種現代批判性真正關注的，其實只是他們懷疑與批判的激烈程度，以及他們自己作為所謂社會良心的傑出

^① Schmitt, *Theodor Däublers "Nordlicht"*, 64-65.

^② Ibid., 64.

^③ Ibid., 70-71.

作用。他們忙於對此時此地的否定、對問題中各種因素的具體拆解，而不是定睛於問題的整體解決。他們其實在無休無止的討論、爭辯和反思中尋找庇護，以逃避做出最終決斷，因為這種支離破碎的細節討論遠比整體決斷容易得多。以此出發，一切可想象的歷史、政治、哲學和神學題目都能被輕率解析反思，而施米特卻認為，這種缺乏根基的所謂反思其實不過是自我欺騙，因為這種思考大多不過是對各種難題膚淺而破裂的觸及。^①這種沒有超驗依據的批判，其本質是對積極改變現實世界的棄絕。批判者對生命的持續懷疑，也將他們自己與讀者的生命消耗殆盡，因為這種無窮無盡的混亂方式，到頭來只是一場遊戲，是對各種實存的玩弄。

對施米特而言，正因為《北極光》沒有像流行的現代批判性那樣——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忙於追逐他人的靈魂，沉溺於對世界的悲觀絕望，才使它具有超越時代的重大意義。多伯勒在根本上感興趣的，不是純粹的時代解說，不是現代病狀的羅列，而是根本的希望與救贖。他的詩歌沒有簡單地諷刺、麻痺現實，而是呈現給現代人一種新的實在，而這恰恰是它的特殊現實意義。因此，《北極光》代表著“一部偉大的藝術作品中隱藏的這個沒有靈魂和藝術的世界之反極”，這部詩作背負著“這個失去靈魂的世界的全部精神平衡力量。”^②

有趣的是，雖然施米特強調多伯勒不是一個時政批判家，但他還是特別指出，《北極光》中的幾個片段，如“坦塔魯斯”(Tantalus)之夜，揭露出最具現實性的時代問題以及機械時代的根基。施米特確信，多伯勒對現代性雖然沒有表現出歷史批判主義態度，但卻比任何批判歷史學家更徹底地認識了現代性。施米特認為，《北極光》以直覺性的清晰視野看透了現代性，因此屬於理解這個時代最重要

^① Schmitt, "Weisheit der Zelle," in *Ex Captivitate Salus*, 87-88.

^② Schmitt, *Theodor Däublers "Nordlicht"*, 65.

的文獻之一。^①在《三論〈北極光〉》專著的最後一章，施米特用很長的篇幅詳盡描述了工業社會中的各種場景，其中幾乎聚集了他到生命最後一刻一直矢志與之抗爭的所有現象。^②他認為，這個冰冷世界的精神荒漠正是現代災難的開端。其實，他的全部作品都反映了他對於現代化技術所取得的勝利的根本藐視。

六、從“敵基督”到敵友觀 ——源自多伯勒詩歌的重要思路

作為二十世紀世界級思想家，施米特最為著名的觀點——亦是十幾年來他在中國思想界深為關注的焦點，就是他提出的敵友觀。其實，這一觀點正來源於他對多伯勒詩歌的研讀，以及在長期反覆研讀中經歷的從敵基督到敵友觀的思路歷程。

《三論〈北極光〉》的最後，施米特通過對多伯勒詩歌的整體解讀，完成了他更徹底的現代性批判，這種批判已不僅是針對機械、技術和金錢社會，也瞄準了現代化世界的文化騙局。他指出，這個功利時代“在不忘記其根本目的的同時，也考慮到人類更高的文化需求。”^③他認為，這種文化騙局首先表現為對藝術幾乎無限博大的寬容，精神世界因此似乎變得越來越豐富。而真相卻是，人們雖然宣稱藝術自由，其實反而不再真誠地熱愛某種藝術或痛恨某種藝術。表面上，受到戰爭的壓迫與威脅的時代似乎已經成為過去，無論是物質也好，精神也罷，似乎都已經可以達到自由、和平與安全的狀態。於是現代人宣布“安全時代的開始”^④，他們相信自己有足夠強大的力量親自承擔起世界的創造者與維護者角色，可以在塵世建

^① Schmitt, *Theodor Däublers "Nordlicht"*, 66.

^② Ibid., 59-61.

^③ Ibid., 62.

^④ Ibid.

造一個新天堂，因此上帝的愛與保護便不再是必需的了。^①施米特確信，正是在這樣一種美好的假象下隱藏著敵基督。他將敵基督的最大特徵及其可怕力量稱為“對上帝的模仿”。敵基督以與基督相似形象出現，足以亂真，他不但表現得“友好、正確、清廉、理智，所有人都會讚美他是人類的幸福”^②，而且“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帖後 2：9）。施米特認定這條看似通向和諧的道路，指向一切的相對化，最終也包括基督與敵基督之間絕對對立的取消，而這恰恰是最荒誕最危險的。正是通過對《北極光》的如此研究，施米特識別並確定了他神學意義上的“絕對敵人”——敵基督，進而在他的政治學研究中力主分清敵友。從此以後，他一生的思想學術研究都始終堅持這一核心觀念，並由此出發繼續對現代性進行了一系列重要批判。

如果要進一步深入理解施米特的敵友觀，我們仍必須繼續瞭解他對多伯勒另一篇詩歌的研讀。

多伯勒《帕勒莫之歌》中的詩句“敵人是我們自己形象的問題”，是理解施米特關於敵人的論述的關鍵句。這首詩是多伯勒 1916 年出版的《義大利頌歌》中的一篇，後者是多伯勒除《北極光》之外的又一巔峰之作，施米特和多伯勒本人都特別珍愛這部詩集。而這句詩如警句般給了施米特對把握敵人形象極其重要的啟發，同樣對於我們理解施米特的“敵人”概念起著關鍵作用。施米特用這句詩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敵人不但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自己，而且敵人形象就源於自我認識。敵人是可質疑我的存在的人，而此等人必然知道什麼才是對我的存在至關重要的。那麼，究竟誰能知道呢？施

^① Schmitt, “Weisheit der Zelle,” in *Ex Captivitate Salus*, 83. 在名為《牢房中的智慧》（“Weisheit der Zelle”）的文章中，施米特這樣描述這種境況：“天堂將成為一個徹底被計畫過的世界，擁有令人欣慰的不受束縛的生產力，有無限增長的消費力，被大大擴張的自由時間以及相應的對自由時間的支配。技術化的地上天堂，被徹底管理統籌的人類。自然的局限不復存在，社會的局限卻抓住了我們。它不僅抓住了我們，還改變了我們。重要的將不再是認識世界和人類，而是去改變他們。”

^② Schmitt, *Theodor Däublers “Nordlicht”*, 61.

米特的答案是：“只有我自己，或者我的兄弟知道。他者就是我的兄弟，而兄弟被證明是我的敵人。”^①“最危險的敵人將自己掩飾為昨日的兄弟。”^②兄弟可能是最危險的敵人，正如歷史所證明的，內部爭鬥、兄弟相殘以及國家內戰通常是最慘絕人寰的。

接著就必須回答“誰是我的兄弟”這個問題。施米特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而是直接追溯到《舊約》：“亞當和夏娃有兩個兒子，該隱與亞伯。人類的歷史也就由此開始。事情的本源就是這樣。”^③他的論述到此中止，讓人感覺他在最關鍵之處欲言又止，向來嚴謹的施米特在他的作品中沒有再論述這一點，而是直接將它作為一切討論的先決條件。從施米特的全部作品來看，他要求在生活的幾乎所有領域都首先做出敵友區分的抉擇，作為一個法學家、政治學家，施米特首先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堅持區分敵友，並逐一將批判的矛頭指向浪漫主義、自由主義和有原則妥協傾向的議會制度，但其實在這些不同的具體敵人背後，只存在一個唯一的、絕對的敵人。例如，在1919年的《政治的浪漫派》中，施米特就指責，浪漫派通過將審美提高到絕對高度，取消了世界上原本的一些重大的對立分歧：“善與惡、敵與友、基督與敵基督，都能變成審美對比，變成小說情節的手段，能夠從審美角度被融入藝術作品的整體效果。”^④

1963年，施米特在《游擊隊理論》中又一次引用了多伯勒《帕勒莫之歌》中的詩句並解釋道：“敵人是我們自己形象的問題。如果自己的形象是清晰確定的，哪裡會有雙重敵人呢？敵人不是出於某種原因要被除去的，或者因為沒有價值而必須被消滅的。敵人是

^① Schmitt, *Ex Captivitate Salus*, 89.

^② Carl Schmitt, *Theorie des Partisanen, Zwischenbemerkung zum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63), 88.

^③ Schmitt, *Ex Captivitate Salus*, 89.

^④ Schmitt, *Politische Romantik*, 17.

個人層面的。所以我必須與敵人鬥爭，以獲取我自己的準則、自己的界限、自己的形象。”^①

的確，施米特一生都在不斷確定敵人的過程中使自己的立場越來越明晰，也同時以一種決斷的精確性堅定自我身分。或許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在發表了《三論〈北極光〉》近三十年後，施米特重新闡釋多伯勒，同時在內心漸漸與多伯勒拉開距離，為的正是更清晰地明確自己的形象，在敵友區分中堅定自己的根本使命。

七、靈智的普羅米修斯還是基督教的厄庇墨透斯？ ——施米特對多伯勒的理解之變遷

1946 年，施米特在名為《兩座墳塋》的文章中補充並修改了他早年對多伯勒的闡釋。一方面，他仍泛泛地重申了多伯勒詩歌不可比擬的語言力量，另一方面，他對自己第一次闡釋的部分內容提出了質疑。通過重新定位“北極光”這一象徵的來源，施米特重新審視了《北極光》的核心概念——“精神”的哲學意義。

施米特在此前 1916 年的闡釋中認為，多伯勒在《北極光》中所表現的宇宙觀完全紮根於浪漫主義的自然哲學傳統中，北極光象徵著地球的本源之光，扮演著太陽與地球之間的中介角色，正是通過北極光，地球才得以在“宇宙倫理審判會上得救”^②，其中明顯影射著基督耶穌作為人類救贖者的形象。時隔 30 年，他在 1946 年的文章中卻承認，“北極光”這一象徵的真正歷史哲學意義對於他，在很長的歲月中一直隱秘不現，而這次，他將多伯勒的“北極光”概念置於聖西門團體的思想背景中。“如今我才知道，北極光其實是從人類靈智中發出的微弱光線，是自我拯救的人類的氣象學符號，是地球上的普羅米修斯們向宇宙發出的塵世之光。”^③

^① Schmitt, *Theorie des Partisanen*, 87-88.

^② Schmitt, *Theodor Däublers "Nordlicht"*, 12.

^③ Schmitt, *Ex Captivitate Salus*, 49.

正如施米特在第一次闡釋中已經認識到的，“精神”是《北極光》的一個核心概念。整篇史詩亦如此結尾：“世界得救贖，精神得高舉”^①——這行詩也同樣刻在多伯勒在柏林的墓碑上。施米特所有作品中唯有 1916 年的《三論〈北極光〉》以基督的話作為開篇詞：“假冒為善的人哪，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氣色，怎麼不知道分辨這時候呢？”（《路加福音》12:56）。這句由施米特挑選的開篇詞，清晰暗示出施米特早年闡釋的前提是基督教信仰，當時他在多伯勒的“精神”概念中看到的也是對基督拯救的隱射：“精神戰勝了懷疑；最終的否定帶來了對所有相對化的克服，帶來了超驗。”^②

而在 1946 年的《兩座墳塋》中，施米特則重新審視多伯勒的“精神”概念，並將自己早年對這一概念所做的闡釋判為誤讀。現在他承認，多伯勒的“精神”概念“來自德意志的形而上學、地中海密教的水窯和普羅米修斯式的亞特蘭大灣水流”^③，詩人將諸多宗教、哲學中的“精神”概念全都以同樣的熱情含納進他的詩性多神論中。“這個詩人生活在所有的宗教和哲學實體中，正如同偉大的潘神與所有的動植物一起生活。”^④他將多伯勒定義為普羅米修斯式的詩人，同普羅米修斯一樣，他們行動的依據首先並來源於一個超驗的神，而是自我與人類的聯結、自己肩負人類責任的信心。的確，多伯勒的“個人宇宙觀”其實是各種神話傳說與不同宗教觀的混合物。這個混合物雖然帶有許多基督教痕跡，卻不能代表詩人即持有基督教的世界觀。《北極光》中的非基督教因素非常明顯，比如對人類自我拯救的描述。

從根本上來看，施米特修正的其實是他對詩人創作動機的理解。施米特在 1916 年的專著中強調，多伯勒並非出於批判動機或審美

^① Theodor Däubler, *Das Nordlicht II, Florentiner Fassung* (München and Leipzig: Georg-Müller-Verlag, 1910), 602.

^② Schmitt, *Theodor Däublers "Nordlicht"*, 70.

^③ Ibid., 51.

^④ Schmitt, *Ex Captivitate Salus*, 48.

緣由，而是基於信仰的敬虔創作詩歌；1946 年，施米特不再將他的詩人朋友視為奉獻自己的“上帝之筆”，而是將多伯勒比作堅信自我拯救的普羅米修斯，這一觀點其實與多伯勒的傳記作家托馬斯·里採爾（Thomas Rietzschel）不謀而合，里採兒也認為：“多伯勒既不能放棄這個世界，也不想改善這個世界，他只是想通過將這個世界提升為一個神話來戰勝這個世界。”^①

如此看來，施米特 1916 年對多伯勒的闡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自白。在這部早期作品中，詩人與批評家之間的界限混淆不清，沒有讀過《北極光》的讀者往往無法確定，《三論〈北極光〉》中反映的究竟是詩人多伯勒的觀點，還只是批評家施米特自己的主觀看法。而第二次闡述多伯勒的時間，對施米特而言無疑是特殊的：那年 9 月他在柏林被逮捕，一直被囚禁到第二年 10 月，一年的牢獄生活帶給施米特許多新的認識與體會，但是如果我們深剖這兩次闡述，便會訝異地發現施米特思想的根本前後保持著驚人的一致，不管是 1916 年還是 1946 年。對自己早年闡釋的否定並不意味著施米特思想的變化，恰恰相反，證明的是他對自己原初立場的堅持。在逐漸遠離多伯勒的同時，施米特與天主教詩

^① Thomas Rietzschel, “Der Jupiter verpuscht, die Sonne in Schlechtem Aspekt, Der Dichter Theodor Däubler als Analytiker seiner Biographie,” in *Theodor Däubler-Biographie und Werk*, 13-28.

人康拉德·魏斯在精神上越靠越近，後者正是 1933 年出版的論文《基督教的厄庇墨透斯》（*Der Christliche Epimetheus*）的作者。^①

在施米特看來，盜火者普羅米修斯正是依靠個人力量把握命運、傲慢地實施宏偉自救計畫的代表，而愚鈍的厄庇墨透斯則相反，象徵對歷史重轡沉默、順服的接受，自我是否閃光並不重要。施米特用“盲目的天命”這個稱呼，來描述當上帝的旨意不能被認識到的情況下基督徒對此的極端順服。施米特既認為應該擔負起包括支持納粹專制統治行為在內的政治行為責任，又想通過“基督教的厄庇墨透斯”之說，來證明自己的政治行為的正當性——他將其解釋為自己在歷史現實中對上帝的無條件順服。施米特最終的選擇——離開多伯勒，親近魏斯，也正是離開靈智的普羅米修斯，親近“基督教的厄庇墨透斯”的過程，這依然是一個與詩性源流對話的過程，正如他自己所說的：

如果我的孩子想知道關於她父親的隱秘天意，並且問我，最觸動我生命核心的詩句是什麼，那麼我不能引用多伯勒的詩句。我不能給我孩子普羅米修斯式的回答，而只

^① 厄庇墨透斯是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的兄弟，作為宙斯因普羅米修斯盜火而對人類的懲罰，厄庇墨透斯從宙斯那裡得到了美麗的潘多拉和她那不幸的盒子。盒子一開啟，各種禍患就湧入人世，盒子裡唯一積極的禮物——希望則被壓在盒底，而且還沒來得及出來，盒子就被重新關上了。一般來說，厄庇墨透斯作為普羅米修斯的反面形象，是一個愚鈍的、事後才考慮後果的角色。普羅米修斯 Prometheus 名字中的“Pro”表示“預先”，metheus 表示“思考/理解”，而厄庇墨透斯 Epimetheus 名字的中“Epi”則表示“事後”，Epimetheus 的含意即“事後理解者”。而魏斯在他的論文《基督教的厄庇墨透斯》中賦予了這個希臘神話人物基督教意義，認為厄庇墨透斯並沒有去思考神的禮物可能帶來的後果，而只是把神的禮物作為自己被賦予的使命而接受，並懷著對將來的希望面對所發生的事情。施米特非常重視這一闡釋並受其啟發，指出基督徒也應從歷史中領受上帝的天命，而不是從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出發安排自己的存在。關於施米特對康拉德·魏斯的闡釋以及由此進行的自我映射及自我辯解，參見拙作《作為文學批評家的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 als Literaturkritiker. Eine metakritische Untersuchung*），第五章，<http://archiv.ub.uni-heidelberg.de/volltextserver/15770/1/Dissertation.pdf>。

能以基督教的厄庇墨透斯式的，用康拉德·魏斯的詩句回答她：

越去尋找自己，
意義就會從黑暗的束縛中將靈魂帶到世界中
完成你必須做的，
那其實是早已完成的，你所做的只是回應。^①

那個時代的德國思想家泰奧多·阿多諾痛呼道“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同樣面對這樣的歷史，我們至今仍深感困惑，自詡為虔誠天主教徒的施米特何能依舊如此談詩。除了《約伯記》般的詩作，還有什麼詩學源流能夠滋養今天的人類靈魂呢？

^① Schmitt, *Ex Captivitate Salus*, 52-53.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Albrecht, Günter. *Deutsches Schriftstellerlexikon.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Weimar: Volksverlag, 1961.
- Däubler, Theodor. *Das Nordlicht II, Florentiner Fassung*. München, Leipzig: Georg-Müller-Verlag, 1910.
- Mohler, Armin and Carl Schmitt. *Carl Schmitt- Briefwechsel mit einem seiner Schüler*. Edited by Armin Mohler, Irmgard Huhn and Piet Tommissen.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5.
- Nienhaus, Stefan. “Denker und Sprecher und kosmische Strahlung: Theodor Däubler in der Interpretation Carl Schmitts.” In *Theodor Däubler Biographie und Werk, Die Vorträge des Dresdener Däubler-Symposiums 1992*, 85-97. Edited by Dieter Werner. Mainz: Gardez!Verlag, 1996.
- Rietzschel, Thomas. *Theodor Däubler. Eine Collage seiner Biographie*. Leipzig: Reclam Verlag, 1988.
- Rilke, Rainer Maria. *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62.
- Schmitt, Carl. *Theorie des Partisanen, Zwischenbemerkung zum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Theory of the Partisan).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63.
- _____. *Theodor Däublers “Nordlicht”: drei Studien über die Elemente, den Geist und die Aktualität des Werkes*.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1.
- _____. *Glossarium. Aufzeichnungen der Jahre 1947- 1951*. Edited by Eberhard Freiherr von Medem.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1.
- _____. *Politische Romantik*, 6th edition.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8.
- _____. *Jugendbriefe, Briefschaften an seine Schwester Auguste 1905-1913*. Edited by Ernst Hüsmert.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0.
- _____. *Tagebücher Oktober 1912 bis Februar 1915*. Edited by Ernst Hüsmert.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3.
- _____. *Die Militärzeit 1915 bis 1919, Tagebuch Februar bis Dezember 1915, Aufsätze und Materialien*. Edited by Ernst Hüsmert and Gerd Giesler.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5.

- _____. *Ex Captivitate Salus. Erfahrungen der Zeit 1945/47*.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2010.
- Tommissen, Piet. *Schmittiana I*. Jg. 17. Brüssel: Eclectica , 1988.
- Villinger, Ingeborg. *Carl Schmitts Kulturkritik der Modern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5.
- Wagner, Richard. *Oper und Drama, Dichtungen und Schriften*, Bd. 7. Edited by Dieter Borchmeyer. Frankfurt am Main: Insel Verlag, 1983.